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新疆通史》课题丛书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

元明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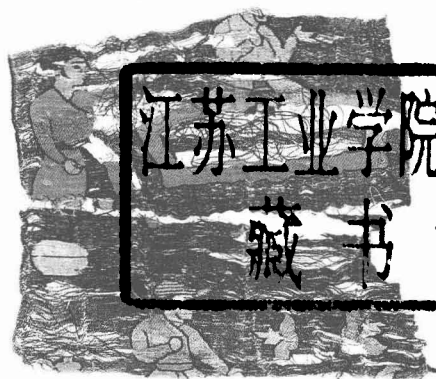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

|| 元明卷 ||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元明卷 / 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228-12121-2

I. 新… II. 新… III. ①新疆—地方史—元代—文集 ②新疆—地方史—明代—文集 IV. K29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6037 号

出 版 :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 830001
印 刷 :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0.75
字 数 : 370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1000
定 价 : 37.00 元

编者的话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对新疆历史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新疆历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不仅促进了学术研究,而且对于提高各族人民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自觉性具有现实意义。

《新疆通史》是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批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的重大科研项目,是自治区文化建设的奠基工程。为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编写好《新疆通史》,我们从广大专家、学者发表的上万篇论文中,选出了 363 篇,编辑成册,分 13 卷 15 册出版,本卷为《元明卷》。

我们主要是从通史的角度来选编论文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论文选定以后,我们征求了作者的意见。除少数论文作者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补充外,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原文照录。

由于我们的水平、接触所限,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见谅!

编者

2008 年 9 月

目 录

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亦邻真(1)
元代新疆史事杂考·····	陈高华(31)
成吉思汗和中亚·····	王治来(46)
元初朝廷与西北诸王关系考略·····	刘迎胜(53)
高昌回鹘亦都护家族及其迁居永昌始末·····	王宗维(67)
察合台汗国疆域与历史沿革研究·····	刘迎胜(83)
元朝政府对畏兀儿地区的统治政策及其演变·····	田卫疆(103)
明代及清初土鲁番统治者世系	
——兼述东察合台汗国之变迁·····	魏良弢(114)
关于明代土鲁番的几个问题·····	陈高华(131)
关于明代吐鲁番史若干问题的探讨·····	田卫疆(145)
两件回鹘文契约的考释·····	耿世民(160)
弓月城和阿力麻里城方位考·····	孟凡人(169)
元代新疆和中原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陈高华(178)
叶尔羌汗国社会经济概述·····	魏良弢(188)
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	
——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	冯家昇(201)
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	韩儒林(211)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回鹘文碑文之校勘与研究·····	
·····	卡哈尔·巴拉提 刘迎胜(216)

畏兀儿文化与蒙古汗国 罗贤佑(270)

元代西北地区的佛教 刘迎胜(290)

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 耿世民(304)

论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 王治来(312)

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亦邻真

蒙古地区见于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从匈奴以来,大大小小的民族和部落出没在这个广阔的高原地带,兴衰频繁。13世纪以后,在蒙古地区形成了具有语言、地域和文化的共同性,以及在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共同特点的蒙古族。蒙古族继承了我国北方各民族长期的分化和融合的历史,把各式各样的部落和居民融成一个民族。

蒙古族族源问题同我国北方各民族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多年来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争论题目。中外学者提出过种种说法,其中每一次科学的严肃的探讨都推动了研究的前进。不断综合前人研究的积极成果,提高研究的水平,会使这一问题愈来愈接近于最后的解决。

识辨族源是带有综合性的研究工作,除了分析研究历史文献记载之外,还常常需要借助于语文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手段,在缺少文献根据的时候,这些手段尤其显得重要。对蒙古族族源的研究来说,文献记载自然是最基本的依据,我国史籍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必须批判地对待文献记载,仔细地辨别真伪正误,才能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语文学资料对鉴别族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特征的第一要素。研究语言资料必须有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臆断杜撰和穿凿附会只能创造失败的记录。人类学资料指示民族学共同体的自然体质特征,对鉴别族属也有很大参考价值。民族是个历史范畴,而不是种族范畴,因而人类学资料的价值是相对的,不能把它提到决定性准绳的高度。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有生动的直观性,这常常是文献资料所不能比拟的,它向我们提供风俗习惯、物质文化的图样,从而揭示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特征。当然,应用这些资料也是有条件的,不能把各族间的文化影响、各族物质文化的某些雷同点和相似处当做确定族源的主要根据。在这些方面,中外学界多年来研究蒙古族族源的实践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正反面的经验。

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绝对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研究工作愈是真实地反映历史过程,科学性便愈大。不是使自己的认识尽量符合历史的客观运动,反而企图让客观的历史适应某种先验的主观成见或实用主义的社会政治目的,这种做法最后总是要失败的。

—

匈奴是蒙古地区第一个见于史乘的民族学共同体,从战国时期就逐渐形成了一股力量。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人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到了公元1世纪末,鲜卑人代替了匈奴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在蒙古高原称雄一时的匈奴人,一部分进入中原,一部分并入鲜卑,一部分西去中亚。

匈奴一名本身就引起了连绵不绝的争论,各家纷纷提出训释:有说是蒙古语“狼”的,有说是突厥语“十”的,有说是突厥语“强力”的,更多的人认为“匈奴”就是蒙古语“人”的意思^①。尽管众说纷纭,还是没有结果。真正的进展是,从敦煌粟特文书信中发现了“匈奴”在粟特文中作 VWN(据说可以读作khun)^②。

匈奴人的族属和语言,更是争论不休的题目^③。P. 帕拉斯以来主张匈奴人即蒙古人的意见曾在上世纪风行。俾丘林的说法很典型:“匈奴是蒙古人的古时族名。汉人把它音译成汉语,使用了两个汉字:匈——凶恶,奴——奴仆。但匈奴这一蒙古词是个专名,并没有汉字的那种意思。”^④ 俾丘林的论据实际上很简单:匈奴人的住地既然是现今蒙古人的住地,匈奴人就应该蒙古人。霍渥尔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这自然是一种土著论错误。断言各民族的地域亘古以来没有变迁的土著论,对游牧民族来说尤其显得

① 参看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东京,1975)第40页。主张“匈奴”应训释为蒙古语“人”的较多,有白鸟库吉、方壮猷等。这种说法并不能成立。13世纪的蒙古语“人”是 kühün,有些方言中是 kümün,后者与畏吾体蒙古文书写形式相同,也许是更古老的语音。白鸟等人用变异和进化最显著的现代蒙古语的khun来比附“匈奴”二字,显然是非历史的。至于训“狼”等等,更是无从谈起的事。

② 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第39、172、173页。

③ 关于匈奴族属问题的各种不同主张,详 K. 伊诺斯特兰采夫《匈奴人和匈人》(列宁格勒,1926)、麦高文《中亚古国史》(1939。中译本,中华,1958)、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1962)、内田吟风前引书。

④ 俾丘林:《古代中亚各族史料汇编》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第39页。

荒谬。J.施米特、B.贝格曼等人也认为匈奴人讲蒙古语。到了本世纪,白鸟库吉由原来主张匈奴是突厥的观点,一变而为匈奴——蒙古说。这种改变,明显地是为了适应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需要。白鸟本人也不讳言,他提出这种主张是为了“诱发”日本国民对蒙古的“好奇心”^①。二次大战以后,坚持匈奴——蒙古说的,主要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上世纪发端的匈奴——突厥说在本世纪取代了匈奴——蒙古说的地位。V.拉德洛夫、沙畹、伯希和、高本汉都站在这一边。一些苏联的突厥学家把匈奴语看成突厥语的祖型,认为突厥语族东西两大支脉都起源于匈奴语。此外还有原阿尔泰语说、原楚瓦什—突厥语说等等^②。

把语言作为识别族属的头等要素是理所当然的。关于匈奴人的语言,文献资料提供了一些线索。西汉人说匈奴“箕踞反言”^③,这很自然地使人想到阿尔泰语系的宾谓句式。北魏时代语言属于突厥语族的敕勒人,“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④。北匈奴的后裔在今北疆一带建立的悦般国,“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⑤。这些记载表明,匈奴人到了南北朝时期,是讲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某一种语言的。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匈奴语从来就是属于突厥语族的;第二,匈奴人在几百年的过程中,语言已被同化,改操突厥语,这也是不无可能的,因为匈奴单于庭从汉武帝时期由今内蒙古地区退到漠北之后,匈奴人便卷进了突厥语族牧人的汪洋大海中,几个世纪的时间足以使他们在语言上被同化。还有一些迹象在加强着匈奴语是突厥语的印象:在苏联阿巴坎附近发掘出的匈奴宫殿遗址中,瓦片上的四个戳记酷似古突厥文的 Le(或 Ĉ)、La(或 I)、A、Sa^⑥。

汉文史籍用汉字记录了若干匈奴单词,并附词义解释;此外就是一大批用秦汉魏晋古韵译写的匈奴专名。学界对这些语言资料的研究,至今没有更多的成就可言,许多结论仅仅是由猜测和附会,甚至是笑料构成的。只有个别单词的解释是无可怀疑的,譬如“撑里”(天)构拟为 * tengri。但这个

① 《蒙古民族的起源》,《白鸟库吉全集》第4卷第24页。

② N.巴斯卡科夫:《突厥诸语言研究导论》(莫斯科,1962)第118~122页。巴托尔德:《突厥—蒙古各族史》,《全集》第5卷(莫斯科,1968)第198页。

③ 《淮南子》卷11《齐世训》。

④ 《北史》卷98《高车传》。《魏书》卷103《高车传》。

⑤ 《魏书》卷102《西域传》。

⑥ 戳记见S.吉谢廖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莫斯科,1951)第481页。周连宽认为,阿巴坎附近的这座遗址是王昭君的女儿须卜居次的宅第(见《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苏联南西伯利亚所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

* *tengri*是个阿尔泰语系通用的词,所以无助于分清匈奴语属于哪一个语族。靠单词分析建立起来的白鸟库吉的匈奴——蒙古说,在学术上是以混乱的方法论为基础的。用信手拈来的现代语言和方言同匈奴语作跨语系跨语族的比附,根本不顾这些语言、方言的历史发展情况。譬如,把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近代布里雅特方言词 *shühütaɪ*(带血)比做匈奴词“若鞮”(孝),不知为什么“血淋淋”却与“孝顺”等义!抛开秦汉古韵,读“屠”(**d'o*)^① 为 *sho*,硬说“屠耆”(贤)与蒙古语 *chike*(直)、日语“贤”(*saka*)、“直”(*sugu*)有关。用诸如此类非科学的方法考释的结果是:十七个单词中被指为属于蒙古语的有两个,属于突厥语的有两个,通古斯语的有三个,突厥、蒙古共通的有一个,蒙古、通古斯共通的有四个,蒙古、突厥、通古斯共通的有六个^②。这里,被指为“通古斯”的词显然占多数(连“共通”的共有十三个,占十七个单词的76%强),但结论却是匈奴人讲蒙古语!为了“诱发”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的“好奇心”,白鸟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矛盾中。在任意性方面比白鸟走得更远的是伊什札姆茨,他在《匈奴的族属和社会制度》^③ 一文中可以说开尽了语文学的玩笑。他连蒙古语词汇、词法的历史都没有搞清楚(更不必说汉语古韵了),便打起反对“反动的突厥史家”的旗帜,宣布匈奴人讲蒙古语。“屠耆”(贤,**d'o-g'ier*),被他说成是 *zhugiin*(现代蒙古语:方向的,方面的),既不知道“屠”在任何时代也不能读 *zhu*,连蒙古语历史常识也不晓得:*zhugiin* 在古蒙古语中只能作 *zhüg-ün*。他不理会“冒顿”读“墨毒”(**mək-d'ök*),硬说就是蒙古语的 *modun*(树、木),于是这个单于就成了木头皇帝!他把“单于”说成“单干”之误,又把“单干”变成了“答刺罕”和“达鲁花赤”。他把佛图澄的一句押尾韵(蒙古语韵文押头韵)的羯语“秀支替戾冈,仆谷勾禿当”毫不费力地变成了近代蒙古语。他还有这样的惊人发现:从“须卜当”、“嵇粥”、“狐鹿姑”这些匈奴人名中发现了速不台、贵由、旭烈兀的同名异译!如果用伊什札姆茨这种方法,可以把匈奴语变成古今任何一种语言。

百多年来企图把匈奴语说成蒙古语的各种尝试,没有一个获得真正成功。

我们至今还无法十分确凿地断定匈奴人的语言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

① 秦汉古音的构拟采用了高本汉《重订古汉字》(斯德哥尔摩,1957)的,下同。这些构拟的正确性当然是相对的。

② 《蒙古民族的起源》,《白鸟库吉全集》第4卷第23~61页。

③ 《科学委员会学术论著(历史、语文)》第1辑(乌兰巴托,1957)第17~38页。

人们习惯于从现代各语言中寻找匈奴语的后裔,而常常忘记另一种可能性:匈奴语已经全然死灭,它同现存各种语言都不相同。阿尔泰语系的蒙古、突厥、通古斯这三个语族是近古和现代的,并不排除阿尔泰语系中原曾存在第四种语族的可能,更不必说阿尔泰语系以外的语言了。不能把土著论的错误方法搬到语言史的领域,认为现代有多少种语言,古代也只能有这些种语言,古今一律,不生不灭。

在对待匈奴的语言资料的时候,必须分清匈奴人和匈奴国。前者是有共同语言、地域和文化风俗的民族学共同体,后者则是匈奴贵族统治下的庞杂的军事行政联合,包括形形色色的部落、民族和语言。从匈奴国范围内随便抓住一词一句来证明匈奴语,十有八九是要失败的。

在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时,也同样有这种情况。从匈奴时期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并不一定就是匈奴人的骨殖。匈奴贵族纠集了各式各样的人组成国家机器,统治阶级中不仅包括蒙古高原各族的上层人物,还傍及中亚甚至汉族,譬如丁令王卫律、右校王李陵就是加入了匈奴国统治集团的汉人。匈奴国的生产者和士兵有好多也不是匈奴人。应当审慎地对待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不能作随心所欲的解释。匈奴最主要的统治集团人物的人类学资料更有助于说明匈奴人的族属,因为他们是道地的匈奴人。这方面,像蒙古诺颜乌拉遗物这样的资料应该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可是对诺颜乌拉出土的人类学资料的研究并不能说是充分的。主要发掘人之一 P. 科兹洛夫曾经表示,与其说墓主是蒙古人种(即“黄种人”),勿宁说是雅利安人种(即欧罗巴人种,“白种人”)①。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学家断言诺颜乌拉墓葬内的骨殖属于蒙古人种②。经鉴定的个别头骨属于长头扁平脸的蒙古人种贝加尔型③,但这些头骨不是出自典型的匈奴人的墓葬的。对诺颜乌拉 25 号墓出土的人物绣像,对汉代马踏匈奴石像,看法都很不一致,有的说像欧罗巴人种,有的说像蒙古人种④。有些研究者还强调见于文献记载的匈奴人的体格特征,引用《汉书·匈奴传》上说的匈奴人“形体魁健”一语,引用金日磾身長八尺二寸、刘濂身長八尺四寸、赫连勃勃八尺五寸、刘曜九尺

① P. 科兹洛夫:《北蒙古诺颜乌拉遗存》(日译文),善邻协会《蒙古》杂志 1935 年 10 月号。

② 参看 Ts. 道尔只苏隆:《北匈奴》(乌兰巴托,1961)。

③ 曼亨海尔芬:《匈人的世界》(柏克利—洛山矶,1973)第 369 页。

④ 水野清一:《关于前汉时代墓饰石像》,《东方学报》京都第 3 册,1933。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 45 页。

三寸(即都在1.8米以上)等记载,说明匈奴人有北欧型的高大身材^①。某些既无铭文,又无年代可考的古董,如大英博物馆藏、从鄂尔多斯搜集来的人像青铜牌,也被用来说明匈奴人的种族特征,虽然这类东西不一定和匈奴人有什么瓜葛。

断定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的考古、人类学资料,主要来自匈牙利的发掘,而不是出于蒙古高原。在匈牙利等地发掘的是欧洲匈人的墓葬,匈人确实属于蒙古人种。但是在民族学意义上断言匈人就是匈奴人,这还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传教士刘应、宋君荣在18世纪初就提出了匈奴即欧洲匈人的主张,之后这种主张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补充和发挥。这类著作之多,几乎给人一种业已形成不可更改的定论的印象^②。F.铁加特、W.麦高文等人把汉朝和匈奴的战争同罗马帝国的动乱联结起来,赋予匈奴历史以影响欧洲历史面貌的远大意义^③。但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历史记载有很多很大的空白,常常靠似是似非、似是而非,有时是明显的穿凿附会的考证来填补。缺乏语言资料,附有明确释义的匈人语言记录连一条也没有。对用希腊罗马式词型译写的匈人人名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据说有突厥、波斯、日耳曼等各语种^④。连匈奴匈人同一论的拥护者内田也认为中央亚细亚匈奴人的人类学特征与匈人并不一样,于是说匈奴贵族是欧罗巴人种,而进入欧洲的匈人是匈奴单于的部分臣民,属于蒙古人种^⑤。这实际上等于说,匈人不是匈奴人。

目前,对匈奴人的人类学特征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定论,尤其不好说同蒙古族一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匈奴人在蒙古地区留下了长久不灭的痕迹,匈奴的某些制度和习俗在蒙古高原各民族中世代流传。左右翼和十进制的军事行政划分,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还使用着左、中、右旗的名称。“月盛壮则攻战”的匈奴军事迷信,在成吉思汗出征乃蛮时还看得见^⑥。匈奴人的服饰在蒙古族中至今有丝迹可寻^⑦。但是继承匈奴制度习俗的不只是蒙古人,

① 曼亨海尔芬:《匈人的世界》第273页。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第150页。

② 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第167~200页。

③ F.铁加特:《罗马与中国》(日译本)第295~310页。麦高文前引书绪论。

④ 曼亨海尔芬:《匈人的世界》第376~443页。

⑤ 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匈奴篇》第155、156页。

⑥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元朝秘史》第193节。

⑦ 梅原末治:《蒙古诺颜乌拉发现的遗物》(东京,1960)图版第49~58页。

道地的青突厥人也是军事行政单位分左右翼,也是“侯月将满,辄为寇钞”^①。祖源东胡的柔然可汗是在征服突厥语族部落高车之后,建立起“千人为军”“百人为幢”的十进制“军法”的^②。可见,匈奴制度习俗的延续流传是由蒙古高原特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各游牧民族对它都有所继承。强调匈奴人的这些特点来硬性说明匈奴人同蒙古族族源有什么关系,是不会有结果的。

从历史上的匈奴找不出同蒙古族族源有重大关连之处。与阿尔泰语系各族相比较,匈奴人更近似突厥语族各族。倘若匈奴人原来使用的是与阿尔泰语系完全不同的语言,那又该另当别论了。如果说匈奴人同后来的蒙古族有什么关系,恐怕只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想见的:一部分匈奴人留在蒙古高原,同化在其他的民族和部落中,这些人的后裔在13世纪以后成了蒙古族的成员。

讨论匈奴人的情况之后,应当提到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各部落。历史文献对突厥语族各部的记载比较清楚,也比较确切。古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释读,为依据文献资料识别历史上的突厥语族各族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唐代以前,大漠南北的蒙古高原大半属于突厥语世界。

汉代的坚昆、丁令是突厥语族部落,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争论。坚昆,一般认为就是后来的黠戛斯、乞儿吉思,这个族名今作柯尔克孜(对苏联境内的柯尔克孜人通常译为吉尔吉斯人),义为“四十”(突厥语,复数),当是指四十个氏族部落的联合。据不晚于6世纪的古代传说,他们同青突厥人有共同的祖先^③。唐以来的文献明确地记载着他们属于突厥语族,《新唐书·黠戛斯传》说:“其文字、言语与回鹘正同。”叶尼塞河流域石刻文字证实

① 《隋书》卷84《北狄传》。

② 《魏书》卷103《蠕蠕传》。

③ 坚昆一名见于《汉书》卷70《陈汤传》、卷94下《匈奴传》下,应当就是《史记》卷110《匈奴传》的“鬲昆”、《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的“隔昆”,与《隋书·铁勒传》的纥骨、《通典·边防》的结骨,都是同名异译。《新唐书》卷217下《黠戛斯传》说:“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并说又名居勿(忽?)、结骨、纥骨、纥圻斯。黠戛斯,古突厥文作 QIRQaS。此名在《元史》中有乞里吉思、吉利吉思、乞里乞思、乞而吉思、乞儿吉思、乞儿乞思等译写。khirkhis是 khirkh 的复数。伯希和认为“坚昆”译写的是单数 khirkhun。《元史》卷63《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传说:“吉利吉思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此名以命其地”,把 khirkhis 解释成 khirkh(四十)加 khis(女)。这个古老的传说至今还有它的变体:三十个女郎在山上生的孩子组成了 on——柯尔克孜人的右翼各部,十个女郎在田野里生的孩子组成了 sol——左翼各部。“四十女”之说显然是民间俗词源学,从古突厥文看,并没有这个词义。《周书》卷50《异域传》上有突厥人祖先泥师都娶二妻生四男,“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的传说,这反映他们同青突厥有共同的起源。

了黠戛斯人也使用古突厥文。《元史·地理志》也说吉利吉思“其语言则[与]畏吾儿同。”《新唐书·黠戛斯传》还记载下了黠戛斯人的人类学特征;“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即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素质^①。

不少学者把“丁令”“敕勒”“铁勒”^②都看成 türkler(突厥人,复数)一词的不同音译。姑且不管 türkler 一名是否有那样悠久的历史,丁令、高车、敕勒、铁勒都是汉唐时期居住在蒙古高原及其周围的突厥语族游牧部落,这总该是无可怀疑的。俾丘林等人认为丁令是蒙古人的说法早已陈旧过时了。

北魏时期,外蒙古高原和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三盟的北半部,都在柔然可汗统治之下。柔然可汗虽说是“东胡之苗裔”,但他的基本臣民,大漠南北的多数人口,都是突厥语族游牧人。北魏时,几十万敕勒人迁来阴山以南。《隋书》对漠北铁勒人的分布作了详细的叙述。《太平寰宇记》列举了唐朝开国之初“散在碛北”的“铁勒部内之诸部”共十五部^③。土

① 把唐代黠戛斯人“赤发、皙面、绿瞳”的特点与现今人类学资料作比较,是很有趣的。据对不同部落出身的苏联吉尔吉斯人的调查,他们的头发多是深暗色的,黑发的人最多。眼瞳的颜色大都是混杂的,主要是褐绿色的。阿来、费尔干的吉尔吉斯人肤色较幽暗,天山和塔拉斯河、吹河流域的吉尔吉斯人肤色较为浅白。身材是中等的,约在 1.63~1.66 米之间。(见 N. 米克拉舍夫斯卡雅《吉尔吉斯人体学研究》,《吉尔吉斯考古—民族学考察队论文集》第 1 册,莫斯科,1956,第 22、25、55 页)唐代的记载也许有某些片面性和夸张之处,但仍可看出,在民族变迁过程中吉尔吉斯人种族构成发生的变化是显著的,欧罗巴人种的因素大大消减了,同任何民族一样,现代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的人类学特征不会与坚昆人、黠戛斯人完全相同。“纯人种”、“纯血统”本来是个非历史非科学的蒙昧观念。

② 铁勒是个泛称,大体上可以同突厥文碑铭中的 Orus(乌护)对应,不无可能,是拓跋鲜卑人把乌护也称做敕勒(铁勒),以致沿袭使用到隋唐。一些西欧和苏联学者说铁勒是 Tölös 的音译,这同铁(透屑开四)、勒(来德开一)二字的音值格格不入,无法成立。此外还有 terek(车,高车)、tirek(扶助者)等说,看来也都是些臆测之辞。参看内田吟风:《北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东京,1975)第 427 页。

③ 见《隋书》卷 50《北狄传·铁勒》、《太平寰宇记》卷 198《铁勒》。这些部落中,如回纥、都播、骨利干、拔野古、同罗等名在各种突厥文字中找到了原文。对另一些部名,许多学者作过构拟复原的尝试。譬如,多览葛,沙晚,白鸟等人认为就是 Teleng - güt(帖良)。此名,《册府元龟》卷 986 龙朔二年条下又作多腊葛。按唐韵,多(端歌开一)当作 ta,览(来敢开一)当作 lam,腊(来盍开一)当作 lap,葛(见曷开一)当作 kat,所以忠实的复原应以 *T(D)al(r)am(b)ghat(r)为基础,而 Telenggüt 与此相去太远。思结,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中作 Isgil(即《阙特勤碑》中的 JSGeL),但岑仲勉却认为 ISGeL 是黠质略,理由便显得远为薄弱了。夏德构拟薛延陀为 sīr - Tardush,除 sīr 外,延陀二字在音韵上同达头(Tardu)实在难于堪同为一,即使把延字强改作诞,也无济于事。在资料和佐证不充分的时候,勉强作这一类臆断性的构拟,总是危险的,靠不住的。

拉河以北是九姓铁勒的牧地,阿尔泰山南北,一直到中亚,也都是突厥语族部落的居住地。在连绵反复的战乱中,各部落常有迁徙。552年,青突厥人推翻了柔然汗廷,建立了突厥汗国,这个汗国很快分裂成北突厥和西突厥。北突厥先后并于隋唐,后来又出现了后突厥汗国。745年后突厥亡于回鹘汗国。药罗葛氏回鹘汗廷取代阿史那氏突厥汗廷,不过是突厥语族各部中的改朝换代,从民族学角度上看,这里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因为有古突厥文、粟特体突厥文(回鹘文)文献保存下来,完全证明了青突厥人和回鹘人的语言属于突厥语族东支的古突厥语。

突厥和回鹘的草原贵族都力图加强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契丹人、室韦一达怛人的统治,在契丹、室韦驻有官员。后突厥还似乎曾向兴安岭一带移民。突厥、回鹘势力进入内蒙古东部地区,便向这一带的各个部落打开了通向大漠南北的门户:有一部分室韦一达怛人约在8世纪后半叶进入了阴山地区。契丹贵族也向室韦一达怛地区扩展自己的势力。从西、南方面,也有许多其他民族人口流入蒙古高原。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极有势力,备受突厥、回鹘贵族的宠遇。一些汉人也流入蒙古高原。羌化的吐谷浑人涌进内蒙古西部,沙陀突厥人也进入了阴山南麓。

经过反抗回鹘汗国的斗争,黠戛斯人在840年推翻了回鹘可汗,大批回鹘人西迁甘肃和新疆地区。对黠戛斯人南下的民族学意义不能低估:突厥语族各部落的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操北部铁勒方言的人口在蒙古高原占了优势。这种方言与青突厥、回鹘的方言有明显的区别,其特征之一就是zh辅音很多,而青突厥人和回鹘人则多是相应地用y辅音。这一点,从原蒙古人进入外蒙古高原后借入的突厥词中可以得到证明^①。

二

大约与匈奴同时见于史乘的是东胡。战国时期,东胡人常同燕国争战,燕国修长城以拒东胡,这道长城从造阳(在今河北宣化市)修筑到襄平(在今

① 如,见于古突厥文的YIL(年)在古蒙古语中变成了zhil, YaRLıQ(圣旨)变成了zharlıkh。这当然不是反映蒙古语同突厥语之间固有的对应关系,而是反映借词来源的不同:当蒙古人借入这些突厥词的时候,突厥方言环境已经变了,讲y辅音方言的青突厥人,回鹘人已迁向他方,蒙古人遇到的是讲zh辅音方言的铁勒人。在现代突厥语世界中,用zh(或ch)代替y的语言有鞑靼语、图瓦语、阿尔泰奇只(卫罗特)语、吉尔吉斯语北部方言等。

辽宁辽阳市),城塞之外的地区很大一部分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征服了东胡人,把他们划归左贤王统治。东胡,是华夏人对内蒙古东部地区族属相同或相近的各部落的总称。服虔说:东胡“在匈奴东,故曰东胡。”^①一些西方学者曾把“东胡”二字说成是“通古斯”的音译,这自然是毫无根据的臆断。在东胡人的时代,人间还不存在“通古斯”这样的族名,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东胡”音译“通古斯”之说了。

东胡人及其后裔的居地大体上就是内蒙古东部地区。从昭乌达松漠到额尔古纳河流域,是以东胡人和他们的后裔——鲜卑人、后来的契丹人、室韦—达怛人为主体的语言相同或相近,地域相连,风俗习惯也相似的各个部落的居住地,可以称做东胡及其后裔历史民族区。对这一历史民族区的各个主要的民族学共同体,应该当做一系列有历史继承关系的对象来把握^②,这对研究蒙古族族源是十分重要的。

东胡人属于蒙古人种。考古—人类学资料没有提供可以另作异议的情况^③。

东胡人的语言是古老的阿尔泰语系语言。根据文献记载,鲜卑人和室韦人、契丹人的语言有一脉相传的遗传联系,保留下来的语言资料虽然为数不多,还是指示出了某些语言的个别特征,使我们可以对东胡后裔的语言作个大体的判断。作过较深入研究的学者常常认为东胡后裔的语言属于蒙古语。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容易造成误会,好像这些语言就是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方言的古代形式。东胡后裔各族的语言同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古今之别。东胡后裔各语言自成一个古老的语言集团,经历了已经无法确知的多次的分化、融合过程,它曾有鲜卑、拓跋、契丹、室韦等许多语言和方言,但大都绝灭了,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只是从其中一两种语言、方言分支发展起来的。如果把东胡后裔诸语言比做一棵古树,那

① 《史记》卷110《匈奴传·索隐》。

② 在这方面,应当提到白鸟库吉的著作《东胡民族考》(《全集》第4卷,第63~320页)。这篇长文把东胡、乌桓、鲜卑、宇文、吐谷浑、乞伏、秃发、拓跋、地豆于、霫、室韦、羯、柔然、奚、契丹衔接起来,当作前后继承的古蒙古人来考察。白鸟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是比较充分的,某些地方表现出有功力。在另一篇著作《室韦考》(同书339~473页)中,白鸟又指出室韦、靺鞨、阻卜都是对兴安岭西、大漠南北蒙古人的三种不同的总称。在这些方面白鸟饶有贡献。当然他这些著述有明显的弱点。如,受他自己制造的匈奴——蒙古说的束缚,白鸟把“匈奴别部”羯人也列入东胡,便不着边际了。至于白鸟对语言资料的处理,充斥着任意性,除了巧合之外,有科学价值的语文分析很少。

③ 参看《赤峰、宁城夏家店上层文化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么可以说树干和好多枝梢都已枯死了,只留下个别树枝移植在新的土壤上,又长出新的树干和枝梢,形成了现代蒙古语族。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东胡后裔诸语言就是古代的蒙古语。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否则很容易走上以今训古,搞俗词源学的道路,做那些徒劳无功的事:企图给每一条语言资料都找上相应的蒙古语词,来证明东胡后裔各语言是蒙古语。一些外国语言学家抽象地谈论什么7世纪以前的“共同蒙古语”“古蒙古语”,并给它假设出一些于史无征的特征^①,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研究不了解东胡后裔诸语言与蒙古语族各语言的历史关系。

东胡人就是鲜卑人和乌桓(丸)人。服虔说:“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三国志》上说:“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王沈《魏书》也说:“乌桓者,古东胡也”,“鲜卑者,东胡之余种也。”^②这都是非常明确的记载。乌桓人最初在老哈河流域,后来分布在东起大凌河,西至鄂尔多斯的狭长地带,不久便并入鲜卑,有的迁入了内地。鲜卑人“语言习俗与乌桓同”^③。2世纪中叶,鲜卑人乘匈奴的衰败,占据了蒙古高原,以今乌兰察布盟丘陵为中心,纠合各式各样的民族部落,建立了“南钲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的大联盟,分东、中、西三大部,有十二大人,强盛一时。在“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人进入内地,鲜卑贵族建立了好几个割据政权,后来拓跋鲜卑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7世纪以后,进入内地的所有鲜卑人最终同化于汉族之中。

鲜卑人是复杂的民族学集团,慕容鲜卑和段氏鲜卑是道地的东胡后裔。考古资料留下了鲜卑人和乌桓人的形象,体形和相貌是属于蒙古人种的。他们的“髡头”是把周沿剃光,头顶留下髻或辮^④。西晋时,从慕容鲜卑分出了吐谷浑部,远去甘肃,转徙青海。宇文鲜卑原是阴山地区的匈奴人,“其语言与鲜卑颇异”^⑤,后来迁到上都河以东。在东部鲜卑中匈奴人也为数不少。

另一个有名的鲜卑人集团就是拓跋鲜卑,他们起源于呼伦贝尔高原,经

① 在G.桑席也夫《蒙古诸语言比较语法》第1卷(莫斯科,1953)和N.鲍培《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赫尔辛基,1955)中都设想出一些六七世纪蒙古语的特征,其中有不少是得不到证明,与历史实际不符的臆断。

② 《史记》卷110《匈奴传·索隐》。《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本文及裴注。

③ 《后汉书》卷120《乌桓鲜卑传》。

④ 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

⑤ 《北史》卷98《匈奴宇文莫槐传》。